

“速生鸡”是“市场失灵”养大的

在行业竞争压力下,为了获取更大市场利益,无论养殖户还是屠宰企业,都有可能冒着风险以违法违规手段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,这其实就是一种“市场失灵”的表现。而监管必须整体发力,才能避免不同地区监管力度的落差。

评论员观察

□本报评论员 金岭

山东部分养殖场的“速生鸡”未经检验流入百胜餐饮集团上海物流中心,此事经央视曝光后,成为牵动公众神经的又一食品安全事件。(本报今日A06版)

问题出在养殖户和屠宰企业,但更应该看到,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自我约束,以及这种自我约束能力的形成,取决于消费者组织、舆论和

公民个人等的监督能力,更取决于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。

这次“速生鸡”事件,之所以令人异常震惊和痛心,一个重要原因是,在眼下老百姓对食品安全问题比较敏感的情况下,一些养殖业者和食品生产加工企业,对消费者的权利和尊严连基本的敬畏感都没有。这说明,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经济训练,况且还有那么多教训摆在前面,一些个人和企业仍然没有培养出基本的道德和法治自觉,其处于原始市场阶段

的自治能力,和我们对企业公民的期待相去甚远。如果市场活动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必须靠强力监管才能正常运行,那将极大地抬高监管的成本,这些成本,必然会直接和间接地转移到企业和社会身上,最终都有可能转移到每个消费者身上,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恶性循环。一个企业的短视,会毁掉自己,也会拖累整个行业。真不知道这样的教训还要重复多少次!

这次“速生鸡”事件,无疑暴露了常态监管中的某些

问题,这值得有关部门认真反思。在行业竞争压力下,为了获取更大市场利益,无论养殖户还是屠宰企业,都有可能冒着风险以违法违规手段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,这其实就是一种“市场失灵”的表现,矫正这种失灵最有效的办法,莫过于政府有力有效的监管。“市场监管”是政府的四大职能之一,对市场主体野蛮的逐利冲动,虽然消费者组织、舆论、公民个人等都有监督权利,但如果

没有“市场监管”的托底,其他所有的监督权利最终都有可能泡汤。值得一提的是,监管必须是整体发力,而不是局部发力,否则不同地区监管力度的落差,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,影响企业遵章守法自我约束的积极性。在竞争激烈的养殖屠宰行业,一些企业之所以不愿规范自己,原因之一就是害怕自己的成本提高了,可能会失去竞争力。事实确实如此,如果一个地方严厉监督,其余地方则对违法违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那无疑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。只有把整

个行业整个市场都监管好,我们的食品安全才有保障,任何一个地方的放纵,都是在给整个行业的自我放纵创造条件,这对我们的监管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。

老百姓希望吃上安全的食品,这个要求不算高。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响,已经远远超出了食品安全本身,它给老百姓带来的那种紧张情绪,恶化了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,制造了一种互相提防的社会氛围,扭转这种态势,靠企业的良知,也靠政府的监管。

公民论坛

复出未必是对“问题官员”的保护

□尹剑晨

“问题官员”复出的新闻又浮出水面。日前,广东中山市农业局发布了调整领导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,在“公考改分案”中被免的该局原党委副书记、副局长何金寿再次出现在领导成员名单中,主要协助局长开展科协和农学会日常工作。面对质疑,相关部门回应称:虽曾被免职,但免职后还是干部;复出后职务的变动也符合相关规定。

梳理“问题官员”的复出之路,不外乎遵循着“出事被问责,冷却一段时间,悄然复出,舆论哗然,解释复出符合

相关规定,最后不了了之”这样的“铁律”。有学者统计过,被问责的问题官员几乎百分之百复出了,而“免职”也如同带薪休假,丝毫不损问题官员的利益。具体在“公考改分案”中的何金寿,甚至来不及被冷却便匆匆复出了。

“问题官员”接连复出,除了考验问责的诚意与干部任免的公正之外,“复出”真的是对“问题官员”的最好保护吗?新华社12月17日披露河北邢台市市长刘大群被联名举报,举报人罗列了刘大群“四宗罪”。而事实上,刘大群也是“问题官员”。刘大群原为河北省农业厅厅长,因“三鹿事件”于2009年3月被

河北省纪委监察厅处以记过的行政处分,2010年1月调任邢台市市长。

刘大群的仕途轨迹虽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“问题官员”复出,但是将“问题官员”再次委以重任,很多时候并不是对他们的呵护。官员出了问题,给民众和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失,必须要接受严厉的问责。唯有严厉的问责,官员才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,并深刻反省。假如问责只是走过场,非但对民众不负责,事实上也纵容了官员。

有学者称,“反腐不是要等官员掉进坑里了再把他拉上来,而是在他掉进坑之前

先把坑填平。”反腐如此,对待“问题官员”的复出同样如此,如果不能保证程序的公开透明,不能以“令公众信服的理由”复出“问题官员”,那么,“问题官员”面前的这个坑其实并未填平,随时都有可能再次掉进坑里。当“问责”成为另一种形式的“保护”时,复出后的“问题官员”未必能如履薄冰,甚至有可能比之前更放纵自己的权力。

想通了这些道理,其实也就不难明白,有时候让“问题官员”轻易复出,其实并不是对他们的最好保护,而是在他们面前又埋下了一个陷阱。

>>媒体视点

编者按: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、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日前表示,官员财产公示不能搞清算,如果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,并且在案发后,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,以换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。

此说一出,争议四起。我们从18日各媒体发表的评论中摘选了部分观点,希望能帮助读者对这一“有条件赦免”论有更全面的理解。

赦免会衍生更多腐败

如此良好的愿望似乎高估了腐败官员的自觉性。基于当前严峻的反腐形势,“有条件赦免”企图以一种有限妥协的方法,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进展,可谓用心良苦。但是这种妥协的背后,在根本上容易伤害法治的公平性原则,法律对公权治理区别对待,给长远的法治反腐带来损害。

暂且不谈有多少官员会自觉清退,也不论“赦免”的具体可操作性,单从原因分析,造成今日反腐严峻形势,根本上就是由于惩治偏软,没有确立起刑事执法的普遍性、严密性。在执法已存偏漏的情况下,再行“网开一面”的方案,岂不是“与虎谋皮”?

对权力缺乏常态化的法治监督,对腐败案件查处的疏漏让法治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力。一旦容忍“赦免”,便会在社会上造成反腐底线的突破,甚至怂恿更多的官员为求“一时之需”而先行贪腐。这种突破法治原则的“赦免”许愿,弄不好反而会强化官员的侥幸心理,甚至衍生出更多“合法腐败”的漏洞来。

(摘自《京华时报》,作者:傅达林)

更显官员财产公开迫切性

从李永忠的主张,其实可以看到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:一是财产见不得光的污点官员太多,二是公民力量不足以形成对问题官员的抗衡。贪腐行为本没有赦免理由,严重犯罪不能因为人家主动交待和退回非法所得就完全免于处罚。但当下对贪腐官员,不得不让法律作某种形式的让步,这完全是无奈之举。18年立法酝酿无结果,可以印证李永忠“赦免说”的实际性。但另一方面也说明,反腐的挑战异常巨大,腐败的程度和危害惊人,当然,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充分显现出来。

如果迟迟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,实行的难度会越来越大。制度的阻力来自腐败分子的反对,随着腐败越来越严重,腐败人数越来越多,财产公开的阻力会越来越大。不得不通过妥协的方式减少阻力,说明时机已经不早,如果还不出台,可以想见,可能性会越来越小。

(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,作者:谢昱航)

■本版投稿邮箱: qilipinglun@sina.com

楼市年底翘尾呼唤调控新思路

□周俊生

针对近期一些城市频频出现的“地王”,国土资源部18日召开房地产调控管理情况发布会,要求各地要采取分割出让、综合竞标、配建竞标、提高付款难度等方式,避免再次出现“地王”。同一天,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1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示,超过七成的城市房价出现同比上涨。这些情况清楚地表明,购房者和地产商对房价未来走向的认识正在悄悄地发生改变。

近几个月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与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的

回暖趋势存在正相关关系。今年上半年,我国经济出现增速下降的局面,房地产市场也进入低谷,在政府为扭转增速下降而推出“稳增长”措施以后,在各项经济数据反弹的同时,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局面。这种状况表明,本轮房地产调控虽已经坚持数年,但尚未收到预期的效果,其症结则在于,在经济结构转型尚未见效的情况下,房地产这个“龙头产业”对宏观经济的兴衰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在政策面上不允许宏观经济出现大面积滑落的情况

下,房价也很难在现有基础上出现大幅度下降。像北上广深这样的特大城市,由于存在丰富的就业机会,对各地劳动力产生了很强的吸附功能,住房必将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,房价在一个相当长时间跨度内的上涨趋势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。相形之下,一些内地二、三线城市,则由于就业市场的逼仄,大量劳动力外流,住房市场需求量不大,因此房价只能处于较低水平。

很显然,针对房地产市场出现的这种新格局,市场调控也应该要有新的思路。对于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城

市,必须继续坚持限购等调控手段,堵住投资投机势力卷土重来抬高房价。而对于一些二、三线城市来说,则应更多地坚持以市场化的原则来管理市场。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,这种建设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周边地区,它不仅对于当地的消费会有促进,对于房地产市场也能起到促进作用。因此,一线城市继续坚持限购等调控政策,中小城市以发展城镇化来带动房地产市场发展,应该是未来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。

“格力千亿大惠全球”系列专题之三

中国“正能量”成就格力1000亿

扩大内需,增长质量,首创精神——这些新时期的发展“关键词”,将会凝聚起更大的“正能量”,激励格力创新实干,去实现下一个1000亿。

“2012年格力空调销售突破1000亿销量在望,格力实现全球首个单品销售破千亿企业的目标成功在即。”——这个消息在格力电器内部兴奋地传播,继而快速向外扩散。随着人们的热议,“格力1000亿”,正在迅速发酵成一个“年度热词”,让整个行业聚焦,令中国的所有消费者沸腾。

种子发育成果累累,必有其适宜的土壤。同样,格力销售破千亿,也缘于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诸要素的高度统一。可以说,时代中国所有正能量的聚合促成了格力的千亿梦想,也将激励着格力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大步迈进。

格力1000亿首先得益于“天时”——格力20余年的发展历史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快速成长期。从“世界加工厂”到中国创造崭露头角;从“摸着石头过河”到全球领跑“大显雄风”;从快速增长的迫切到科学发展转型的跨越,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,格力的每一步都与中国经济的繁荣高度契合。社会

主义市场经济的厘立和逐步深化,让家电业成为自由竞争最为充分的行业,也大大增强了格力专注科技创新的信心和积极性。

20多年来,格力不为短期利益所惑,不为任何“花哨”所扰,专注技术创新,为中国创造争气。格力用20年的时间,培养出了5000多名科研人员,两个国家级技术研发中心,9个研究室,26个研究所,900多个实验室,6000多项专利,每年的研发投入数十亿……“实干兴邦”,格力用20余年的艰苦实践,深刻诠释了这条宝贵的道理。

格力1000亿也得益于“地利”——格力电器的总部珠海,身处

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,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。而格力特有的“渠道”模式,又让它与中国各地的地域文化有机融合,招得胜算,形成了格力无法复制的“核心竞争力”。

以山东市场为例,在继承了格力电器“创新实干”的企业文化基础上,山东格力人将儒家文化中的“仁义礼智信”融入其中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“厚道营销”文化,依靠它,在山东这场中国家电业的“竞争焦点”上,格力开辟出新天地。目前,格力在山东市场占有率已超越20%。

格力1000亿更得益于“人和”——当前经济寒冬尚未过去,行业的整体下滑,消费的低迷,让一些

企业陷入了一时的困境。而格力却仍逆势增长,销售一举突破1000亿。格力电器董事长、总裁董明珠表示,在经济不太景气的大环境下,人们的消费会更加理性,选择的余地会更高,整体的蛋糕虽然小了,但格力切到的反而大了。全球制造业竞争日趋激烈,广大消费者更希望看到自有品牌的崛起,而格力的“全球品质”正好迎合了消费者的期待,并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。

扩大内需,增长质量,首创精神——这些新时期的发展“关键词”,将会凝聚起更大的“正能量”,激励格力创新实干,去实现下一个1000亿。